

中國道教現況

駱家維著 勞寶霞譯

（編者按：駱家維 John Lagerwey 先生是法籍漢學家，對中國民間宗教十分關注，並經常訪問中國大陸，與國內的宗教研究人士交流。駱氏應本刊的邀請執筆，以法文撰寫當代道教的發展。本刊英文版編輯安貝蒂修女將其譯為英文，再由勞寶霞小姐譯為中文，以饗讀者。）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們先重溫自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掌政以來，中國宗教政策的演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政府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肯定人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正式中止了十三

年來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動及有系統地破壞宗教崇拜場所的政策。

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二個重要事件是一九八二年的憲法修改。新憲法第三十六條重申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年，重要的《十九號文件》草案擬完畢，穆藹仁稱它是「中共政府對宗教和宗教政策有史以來所下的最明確聲明。」（穆藹仁，92，頁~）穆藹仁在翻譯這份文件時一開首便寫道：「那些認為宗教會在經濟文化發展有一定成就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很快地式微的人，是不切實際的。那些期望依賴以行政法令或其他高壓方法來清除宗教思

想和習俗的人，更與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大相逕庭。」（同上，頁二）

《十九號文件》對政府認可的五大宗教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的轉變進行分析：伊斯蘭教的問題基本是種族問題，現有一千萬教徒。佛教和道教對漢族人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影響。至於基督教方面，一九四九年只有七十萬教徒；一九八二年的教徒數目已增至三百萬人。而天主教會（教徒數目曾由二百萬增至五百萬；並一度高達七百萬，現減至三百萬人。）亦已從殖民地及帝國主義的勢力解放出來。該文件續指出：「不少人（漢族人之中）自然地傾向相信有神靈的存在，但真正歸依某一宗教的人數卻不多。」（同上，頁二）該文件接著猛烈抨擊「左派份子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所作的錯誤，指他們違背了黨原來的宗教政策。」它強調會根據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所定下的政策辦事，並提到：「所有被禁的秘密反動組織、巫師和巫婆，都毫不例外地禁止再恢復活動。最後，看相、算命和看風水的人必須

接受再教育和警告，並接受幫助，重新以勞力來維持生計，不再重操故業來矇騙他人。」（同上，頁二）

因此，只有官方所認可的五大宗教才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其他傳統習俗被貶為「封建迷信」，禁止傳授。《光明日報》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廿一日刊登了一篇由牙含章執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當我們談及封建迷信時，通常是指卜卦、摸骨、看相、測字、占星、驅鬼治病、扶乩、燒香奉獻、求神賜子、做法事以求避禍或求雨等等。」（同上，頁203）這份目錄雖然並非由官方所定，但多少也反映了當局的想法。牙含章所提到的習俗，不少來自道教的傳統，至今仍遭禁制。

顯而易見，禁止並不表示不存在。某些資料的數字更令我們感到疑惑：在上海附近一個生產大隊，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不信」有神靈的存在。在浙江省某地，過往的四百多所廟宇曾經被毀，但現時該地竟「有不少於五百所非法廟宇和寺院，其中二

百五十六所建於一九八四年以後。」（同上，頁388, 393, 394）然而，這些數據的可靠性卻使人存疑，甚至是有關政府認可的五大宗教的數據也未必正確。例如：有關基督教徒的數目，是在五百萬至一億之間。一億之數是據香港一個傳教研究中心所估計的；而五百萬之數卻是國內一個謹慎的基督教領袖為免引起當局的不安而作的數據。

道教的復興

道教自始已植根在中國社會和傳統裡，且常被政府誤會為迷信習俗，所以有研究的必要。道教自一九四九年的盛衰起跌更真實地反映了中國文化與人民政府的關係的轉變。在近期一本名為《當代中國道教》的書裡，作者李養正提到，在全國道教協會成立之時，一些「老道長」估計當時全國有一萬所道觀，住有五萬位全真道士或正一道士。李養正指出，要在人群中估計道教徒數目並不容易。在一

九八九年，全國道教協會主席黎遇航表示，中國共有四百所公開廟宇及五千名道士。（《中國道教》，92.1，頁3）

即使上述所舉的第一個數字的可信性明顯低於第二個數字，但它們至少也可反映「公開」道教在一九五七至八九年間觀內活動的轉變。以下以陝西省作一例子：

	道觀	道士	道教信眾
1948	696	1075	11432
1965	18	790	3524
1980	5	310	1000
1991	70	500	-----
1992	86	-----	-----
1993	70	600	-----

〔資料取材自《三秦道教》1992年第一期，頁12-13；1993年第一期，頁4。〕

在陝西省，一九九三年的道觀數目只有一九四

八年的百分之十，可媲美上述統計數字中全國道觀數目的百分之五。其中一個導致道士人數在同一比例中相差不遠的原因，或許就正如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的，在陝西省的統計數字中加進了很多正一道道士。甘肅省是另外一個我可以設法找到數據來比較目前情況與一九四九年情況的省份，但只包括武威市和張掖市的資料：

	道觀	道士
武威	1949 6	100 以上
	1993 1	300
張掖	1948 30	300
	1993 1	192

嚴格來說，武威市猶如張掖市一樣，實際上只有兩個全真道士，但武威市卻大約有「三百位正一道長」；而張掖市則有一百九十位。因為正一道長的人數被計算在內，所以才會造成道士的數目較大。

以下的圖表有助我們了解甘肅省近日的變化，該省現有兩個省級道教協會及不少於九個地方協會。

	道觀	全真道士	正一道士	教衆
1990	60	---	---	---
1992	100	300	1500	---
1993	120	300	800	1200

在一九九零年實際上只有三十所道觀獲官方認可；另外三十所未獲官方承認的，僅以「活動場所」形式開辦，看來上述的數字更顯意義。此外，一九九三年的數字代表官方認可的道觀數目。而正一道長的人數較一九九二年的數目為少，是因為一千五百是一個全省的約數。只有蘭州、武威、張掖和白銀等城市的正一道士數目才算入正式的統計。

我們必須緊記，這個協會只在一九五七年成立。李養正指出，在一九四九至五七年這段期間，當時的道士正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層面上，從事改革這個「極度封建」的宗教的工作。（李養正，一九九三，頁6）成立這個協會的決定由瀋陽太清觀的丘崇岱道士提議，得到黨和同道的支持。於是，一個有廿三人出席的預備會議便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北京舉行。

丘崇岱得到周恩來總理親自接待。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道教協會正式在北京成立。（李養正，頁112）在九十二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與會代表中，有兩位女道士和六位正一道長。（李養正，頁57）首位道教協會主席丘崇岱在一年之後自殺身亡。他曾在「九五八年春的「反右運動」中受到惡毒的攻擊。（李養正，頁12）

不少道觀在一九五八年積極地投入「大躍進」運動大煉鋼鐵。道士們把香爐、鐘和銅鼎都掉進鎔爐裡。他們加入人民公社，投入生產隊伍。道觀的活動也停止了。道教協會的另一次會議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舉行，在九十九名與會代表中，有十二位女道士和十四位正一道長。著名的道教徒陳櫻寧在會上當選新主席，並以投票方式通過辦一個學習班和出版一本道教評論雜誌。（李養正，頁59-60）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下旬，陳櫻寧在出席道教協會第二屆理事會會議之後，親自往黨中央全國委員會解釋。他指出，道教雖然有「恆久的古代形象」，但實

際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道教已完全的改變了。道士們現已不再由一道觀轉到另一道觀服務，而是大隊中的一員，有固定的工作。道士們也不再出世，而是「對將來抱樂觀的態度」。總括而言，道士們在經過長期的學習後，都能明白到：「國家的命運就等如每一個道士的命運，對黨絕對的依賴便已足夠。他們願意接受黨的指揮，以積極的態度來參與建設社會主義，保護群眾的利益，並幫助個人再一次找到自己。從現在開始，無人再需要為自己打算。」（李養正，頁14）

道教協會第三屆會議在一九八零年五月舉行。李養正在書中並沒提及道教在一九六二年至六六年間在中國的發展情況。他只提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有三百三十七所道觀；有五千位道士在道觀中服務；另有成千上萬的散居道士。

當道教協會在一九七九年恢復活動時，「沒有一所道觀是正常運作的」。現在（一九九三年），全國有四百所公開道觀、一萬二千位全真道士、約五萬位

正一道長及最少有一千萬中國人奉行道教的禮節。」道教最後已重獲它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地位。（李養正，頁15）

在道教協會第三屆會議中，溫州的全真道道士黎遇航被推舉為新主席。大會更草擬了「致台灣省道教界書」，向對方示以友好的態度。（李養正，頁63）從現在開始，道教將會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貢獻，並「實事求是」。（李養正，頁62）

一九八二年十月的會議上，列舉出二十一所「全國重要宮觀」。與會者並訂立一份「公約」，承諾支持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制度，並答允只進行不相反社會秩序及生產工作的合法宗教活動，不向信眾索取捐款以建宮觀，並且不以宗教進行任何非法活動。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中，與會者議決「要深入調查各地道教現狀」。（李養正，頁64-65）

一九八零年的第三屆全體大會只有五十二位代表出席。然而，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至十七日的第四屆代表大會，與會代表人數回復到文革之前的水平，

政府亦對道教的改變表示滿意。九月十七日，九十七位與會代表聯袂前往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的政治局成員習仲勛表示，「希望道教協會為繼承和發揚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做出更大的貢獻。並為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李養正，頁68）政府及道教協會之間達致了共同的立足點。

一九八七年春，北京白雲觀重辦廟會慶典。原本屬於「內部發行」的《道協會刊》，改由公開發行的《中國道教》所取代。同時，五位道教人士正式訪問香港。一年之後，道教協會也派出成員到加拿大多倫多講授「道教哲學及道教氣功」等課題。（李養正，頁69）一九八八年的理事會上，道教協會首先觸及兩項敏感問題。首先是在許多鄉村地區，正一道的道士沒有地方可以舉行道教禮儀，導致道教生活不能正常進行。與會者要求深入了解正一道在鄉村地區的困難，以便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道教》892頁）事實上，中國政府容許進行傳授符籙的禮儀，等於默許該宗教在短期內不會消失。然而，一旦容許

討論正一道的問題，其他「傳統」宗教行爲的問題隨即蜂湧而來。

經過一連串討論之後，議決成立一個委員會，去籌劃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的全真道入道禮儀。在入道的七十五位道士當中，百分之四十是女性。（《中國道教》902, 頁4）《中國道教》一九九零年二月號的社論，特別提到全真道所堅持的高度的倫理操守。該刊指出在過往一年，並沒有道教人士參與「反革命暴亂」。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秋季，《中國道教》的編者聲明他們堅決支持在首都平暴所採取的措施。

一九九零年六月道教協會在杭州開會，商討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如何將獨立活動的道教人士拉回大隊中。會議中也討論了另一問題：如何將正一道與封建迷信、與佛教及與民間宗教分辨開來。一九九一年十月，正一道舉行自一九四六年以來的首次傳授符籙典禮。地點並非如一九四六年的在四川舉行，而是在江西省的龍虎山。來自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三十六位道教人士前來參禮。一九九二年三月，道教協會

第五屆理事會舉行。一百一十五位與會代表當中，有二十位來自正一道。會上表決通過「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試行辦法」。

這份文件首先界定正一派的定義。對於支持黨及社會主義、有正一法派師承關係、能從事正一派日常壇醮儀典者，可算為合法道人，予以登記發証，並可開辦道教活動場所。由已經登記道人在經政府批准開放的道教場所主持的醮禮，是「合法的宗教活動」。該條例更容許道士「按傳統」到道衆的家中主持喪禮。然而，所有「扶乩、跳神、算命、看相、抽籤、趕鬼、看風水等危害社會和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封建迷信活動，必須禁止。」（《中國道教》924, 頁6-7）

文件的寫法在道教看來是非常開放的。可惜它未能觸及整個傳統道教禮儀的問題。即使這些禮儀從來不是道教及佛教的核心部份，但一如其他「民間宗教」的禮儀，在過往數百年來一直受到通融。

總體而言，這份文件在實現道教宗派自由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這些在一九八五年甚至一九九零年仍

受公安部管制的問題，現在轉而由宗教事務部監督，由道教人士自行管理。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遊街」及焚毀所有手稿的上海道人陳蓮笙，當選為道教協會副會長之一，顯示出正一道已得到正式的認可。

上述有關正一派的統計數字，大多來自《中國道教》一九九二年以來的各期報導。唯一例外的是上海市早在一九八九年經已公佈約有正一派道士一千人，其中在市區約有一百人。一九九二年的報導指出，自一九八三年起，上海各地區紛紛開設新的道觀，以解決正一派道士及信眾缺乏場所舉行禮儀的問題。（《中國道教》89.4, 頁5-6）上海市近年來一直維護正一派道人舉行禮儀的權利，然而，授籙的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中國道教》94.1, 頁7-8）

全國方面，統計數字主要來自一九九二年開始的調查工作，但亦有取材自道士及學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張天師的後人張繼禹，他一直主持道教協會秘書處的工作。一九九零年他發表了一篇有關正一派授籙的文章。在國際上深受敬重的四川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

園國亦曾撰文，探討「道符」與一般符咒的分別，由於兩者有相關之處，經常被人指為迷信行爲。李氏的文章也提及民間流行且獲政府准許的「氣功」活動。

除此之外，省級及地方上的道教協會數目急增，道教機構所從事的慈善工作亦不斷增長。以溫州為例，一九九一年二月成立了從事公益服務的基金會。該會至今已分發了多達七十八萬元人民幣。（《中國道教》93.3, 頁19）一九九一年，溫州樂清地區募集到二十三萬元人民幣，大部份用作支援華東水災的救援工作。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北京白雲觀恢復舉辦羅天大醮。得助於來自香港、台灣及各地的參禮者，慶典期間共收集超過一百萬人民幣，捐予資助農村辦學工作的「希望工程」。

省級或地下的道教協會共計超過八十個，（李養正，頁77-94）數目且自一九九零年持續上昇。在十個省市級的道教協會當中，只有遼寧省道教協會的歷史可遠溯至一九八四年，上海市及甘肅省則始自一九八五年，陝西省及湖南省始自一九八六，河南省則自

一九八七年。另外，江蘇、安徽、湖北省則自一九九一年才組織籌備理事會。廣東省的道教協會則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才成立。（China Study Journal, Vol 8, No. 2, 1993）。山東省道教協會亦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才告誕生，它從籌備直至成立足足用了七年時間。（《中國道教》932, 頁4）四川省的道教協會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但遲至一九九三年才告恢復。（《中國道教》933, 頁31）江蘇及湖北省的道教協會同樣在一九九三年成立，（《中國道教》933, 頁31; 941, 頁6）然而，中國尚有多個省份未有道教協會。

再現壓制

道教目前享有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最自在的日子，然而，當局在不同地對一些傳統宗教禮儀仍有禁制。各種靈異活動，雖然有的被視為落伍，但只要不影響及他人，都紛紛重現民間。風水學說顯然已在中國農村因應其本質而重現，且亦不見對社會秩序有任何妨礙。

另一方面，在道教活動中極具重要地位的符咒，卻仍在受禁止之列。除此之外，道教與政府合作良好。道教人士本身亦強調與民間流派有別。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道教》曾刊出一篇文章，強調必須分辨道教與神秘宗教的差異。該文章提到，要深化落實宗教自由政策，必須小心地將得到認可的合法宗教活動與會道門的迷信活動分辨開來。

《中國道教》另一篇文章談及如何在陝西省眉縣成立道教協會的經過。眉縣道協的會長王興禮道長表示，他們會同地方上的宗教機關及縣城的幹部，深入探訪了全縣開放的十八所道觀，取締了五處道觀由會道門控制的廟會權。一九九一年，經過王興禮對會道門的巫婆、神漢的勸諭教育之後，終於說服了胡全發將一份四十多人的名單，連同道器經書，一同送交公安機構。胡氏更表示悔改，不再參與反革命的會道門，而且歸依了道教。（《中國道教》933, 頁21）

一九八七年六月通過的「陝西省道教協會關於道教宮觀管理試行辦法」，明文規定禁止在道觀中舉行

「跳神」「趕鬼」等封建迷信活動。該規定又禁止巫婆、神漢及會道門份子在道觀中進行活動，諸如迎神、驅鬼等等誤導民衆的行爲。任何人不得利用道教迷惑群衆及擾亂社會秩序。（《中國道教》881，頁6）

這種情況一如加爾文（J. Calvin）在《基督宗教》一書所探討的，「革新教徒」與「再洗者」之間的分別。前者要成爲良好及忠誠的公民，後者卻僅僅出於群衆壓力。同樣，道教必須認清他們的「宗教」與封建迷信及會道門之間的分界。後者是出於心虛或恐懼。這些古老的民間傳統與精英社會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恐懼在過往兩千多年以來，往往成了政治叛逆的起源。因此，公安局在一九八五年撰寫了一份文件，譴責在農村地區會道門及反動社團所引發的破壞事件持續增加。該文件指稱，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間，除了西藏以外，所有省份的公衆秩序均受到滋擾，情況在河南省、陝西省、四川省及雲南省尤爲嚴重。（Munro 1989, p.49-50）該文件特別提到一貫道（該教派在台灣到最近才取得合法地位，）據報涉及一九八

三年全中國十九個省市四十四宗記錄在案的事件。上述在《中國道教》出現的文章亦提到先天道，紅三教等等，並用上許多帶有「民間宗教」色彩的名詞，諸如「三教合一」、茹素等等。

有的時候，道士亦會主持這些祭禮或慶典。道士同樣爲人趕鬼治病。幹部當中亦有人成爲這些流派的信徒。有些教派會是由國民黨所操縱，例如正空教，雖然它過往在中國遭禁，卻在海外華僑團體風行一時，且曾於一九七八年嘗試返回江西省建立一個據點。該派聚集信徒拜道，及向父君獻祭，該教派亦相信這父君必會回來救世。自一九八零年，皇極教在浙江省復興，修復或重建了二十三所道觀；在河北省，他們重印並發行曾經散佚的書籍。這些教派都「打著宗教自由的旗號」去掩護他們的活動。

Munro 所編的文集中收錄了一篇文章，題爲「鄭敏皇帝的興衰：自身國的個案」。文章主要講述李廣昌（又名鄭敏）的故事。事件發生在浙江省溫州地區蒼南縣，當地有許多「散居」道士自行活動。在其他

人的協助之下，他們成立了「自身國」，且由鄭敏自任皇帝。他首先從福建招募「百官」及「軍隊」，後來遍及山西、浙江、江西及廣東各地。後來，到處都有流言說自身國皇帝即將登位，即將出現的皇帝姓李（切合了公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道家傳統的預言。）

謠言又說自身國擁有核子武器，將會發動世界大戰，以改朝換代，並且有天兵來協助他們。自身國的信徒都獲派「護身符」，農民紛紛變賣家當，換取將來在新朝代中的高位。到了一九八四年，他們終於效法公元第二世紀的黃巾賊的做法，決定起而出擊。他們迅速佔據了福建省寧化鎮一些地區，並在鄰近明溪縣一座寺觀集結。然而，公安局包圍了整座廟宇，拘捕了所有首領，只得李廣明一人脫身。兩個月後，李廣明亦在山東省被捕。

我們實在無法衡量這樣一個報告，是一個真實事件，抑或是公安當局的捏造。我所能知道的是，一九八九年當我途經下轄寧化縣及明溪縣的三明市時，當地道教人士與當局的關係顯然遠遜於毗鄰龍岩地區的

道教人士。在龍岩，我可以參與道士在多處地區主持的農村禮祭。在三明市，我所遇到的只是一些誠惶誠恐的道士，幾乎連與我談話也不敢。在建寧地區，我花了很多心血和氣力才找到一位道長，最後總算願意和我談十五分鐘。他告訴我，在一九八八年秋天他在人家主持祝壽時被捕，結果他與所有參禮者都被罰了二百元人民幣，並且嚴禁再參與「封建迷信活動」。他表示，自此以後再沒有人敢舉行祭禮。

我在同一地區所遇到的另外兩位道長，一位來自寧化縣，一位來自龍安市，都急不及待的與「迎神趕鬼的封建迷信分子」劃清界線。其中一位認為自己是佛教徒；另一位是道士，但卻一樣恐怕自己的法事被算入為「迷信活動」之列。在北方，一位道士悄悄向我說，他夤夜到一位信徒家中主持殯儀，尚是文革以來的首次。

所有於一九八五至一九九零年間在中國大陸進行道教研究工作的人士，都會遇上同樣複雜而且不斷轉變的處境。Ken Dean 生動地描述一九八六年安溪縣

清水祖師的慶辰。在第一天晚上，兩位道士剛剛想公開舉行祭祀時立即被捕，第三位道士則在凌晨三時以半隱晦的形式舉行祭禮。另外三位參禮者在翌日被捕，但似乎並未能阻止人們前往參禮。在其後三日，他們抬著清水祖師的塑像逐村遊行，完全不受公安當局干預。另一方面，在一九八七年，儘管有海外華僑參與，公安當局仍多次干預，制止遊行舉行。Dean 認為這可能與胡耀邦下台之後的政治氣候有關。（Dean 93, P.101-113）

事實上，不斷轉變的政治氣候深深地影響著人們舉行宗教拜祭的自由度。在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九月之間，我連續三次造訪九峰鎮（屬福建省漳州地區平和縣），體會到當局與農民之間的三種不同關係。四月初，農民興高采烈地籌備慶祝中秋節以酬答「城隍老爺」。農民計劃按一九八五年的做法，邀請江西省龍虎山的汪少林道長前來主持慶典。他們更提議我屆時回來協助祭禮。在這一天我剛剛離開中國，胡耀邦也在這個時候逝世。

三個月後我返回九峰鎮，慶典的籌備人士帶我去見當地的黨委書記。這位書記按村民的要求發予我許可證，我亦同時得到地區統戰部批准參與慶典。一九八九年九月，當我再回到九峰鎮協助慶典時，有關事宜已不再由統戰部主管，而改由公安部接手，汪少林亦被遣返龍虎山。當地的道士及地方領袖遭到拘禁及罰款。這些地方領袖在兩周後獲釋，他們只准舉行一次極為簡短的祭禮。

一年後，「除六害」（包括封建迷信在內）的運動雷厲風行，廈門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標語，嚴禁閩南地方流行為猝死者舉行的「普渡」禮儀。「除六害」運動認為「普渡」助人斂財、浪費金錢、使人相信鬼魂的存在，並且擾亂公安。然而，在毗鄰的農村地區，「普渡」禮儀照樣舉行如儀。僅僅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一年，中國再次全面投入發展經濟，公安當局對待傳統道教禮儀亦採用較柔和的手法。一九九零年，公安當局關注各地特別是沿海地區基督徒團體收納海外非法捐款的問題，遠較對「封建迷信」活動的關注來

得大。

結論

自一九九零年以來，每年我都回到這些地區住上一段短時間，自六個星期至三個月不等。我感覺到公安當局對待傳統宗教禮祭的手法一次比一次寬鬆。然而，這並不表示，傳統宗教禮祭在所有地區都得到容納。事實上，也有人告訴我，最近在廣東省的韶關市，所有大大小小的廟會全部被禁。不過傳統宗教禮祭似乎已開始落地生根。即使是不隸屬佛道兩教而僅是傳統崇拜的廟宇，也不斷重建。地方上不少幹部也開始放棄了他們的反迷信立場。

假如我的觀察無誤，幹部的態度象徵著一個強烈的轉變，不但是自四九年以來，更是本世紀以來的大變，一改過往兩千年的作風。事實上，在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過往兩千年間一直不時發生打擊民間宗教的事件。打擊的手法自一九一一年以來越見有組織，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更達致高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中

國的統治精英希望帶給國家一個現代化的形象，但結果卻仍是毫無起色的封建。然而，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特別是在一九八五年以後，中國開始真正邁向現代化時，才開始對民間宗派採取開放的態度。近年來，探討民間宗教的研討會及書籍如潮湧現。一九九二年，厚達一千四百頁的鉅著《中國民間宗教史》面世。第一章的主題就是漢代末年的民間道教。

中國的學者有時在著作中仍顯得戰戰兢兢，他們會使用一些中性的字眼作書名，不直接談及「宗教」，而改稱為討論「民萃」。在某次探討廟會的研討會舉行後，與會者出版了一本書籍，強調在廟會中的迷信性質。作者誠然以非常學術性的態度去處理這個課題，但仍小心看待那叫人詫異的風俗。

簡單來說，目前大家都大概認同了一項變化：從今開始，由漢族以至各少數民族，都有權按自己的方式及當地的風俗去生活。起碼在理論上如此，在現實世界中亦逐步實現。在中國，這種新的共識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及歐洲共產主義沒落的年代才顯得成立。中

國意識到宗教在共產主義政權倒台過程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以及後來西方人士湧入中國尋金，促成了中
國意識到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如一
九九三年所出版的《福建文化》一書的序所言，中國
在探索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必須同時發
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作者認為這種文化必
須吸收外國文化的優點，以此作為發展本身優越文化
的原則。假如不能好好掌握這原則，便無法締造出新
的文化，這是無可改變的定律。

儘管在台灣、香港、及海外的華僑社會內，中國
文化經已完全現代化，更出現西方文化魔力與傳延至
今的既有社會結構、禮制及神話相抗衡的局面。

中國現在已進入了新的文化再適應時期。

跋言

一九九四年十月中旬，我訪問上海，再一次肯定
了我的觀點。首先，我想略提兩次接連的會議，一是
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在上海舉行，另一則於一九九四年

十月在北京召開。這些會議要為十月底在龍虎山的正
一道舉行法事的問題定案。正一道的問題似乎必須來
個最終的解決。其次，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答允把
上海市的城隍廟交還給道教人士。這象徵著一大進步。
在一九一一年之前，城隍廟遍及全國，儘管沒有政府
代表的支持，但城隍卻是民間宗教的神祇中極為重要
的一位。重開城隍廟，尤其是重開座落上海市這個大
都會核心地帶的城隍廟，顯然不單是重建社會與民間
傳統的關係，更為預備迎接「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參考書目見本刊今期英文版頁25。）